

成都市西城区政协历史简况

萧芳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广泛代表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政协成都市西城区委员会于一九五七年二月成立，至今已有三十二个春秋，它的前身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一九五一年四月至六月，西城区的前身原三、四、七、八区分别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首届首次会议，会上选举产生了各区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原三、四、七、八区调整合并为二、三、六区，各区先后成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日，二、三、六区又调整合并为西城区、成都市西城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亦相应成立。

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一九五〇年六月，全国政协《关于地方委员会的决定》规定，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代行政协地方委员会的职权。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五年期间，我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紧密围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减租退押，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等一系列革命运动和建设事业，在协助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推动各界人士参加实际斗争和时事政治学习等方

面，做了许多工作，对于团结各族人民，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成都市西城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会议鉴于西城区人民代表大会已于一九五四年六月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布结束。同年十二月八日，中共西城区委邀请我区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代表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组成政协成都市西城区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经过两个月的准备，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胜利召开，西城区政协于此诞生。

现将历届区政协的简况分述如下。

第一届委员会：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有委员 110 人、常务委员 23 人(兼主席、副主席、秘书长滕琳，下同)。

主 席 贾庆诰(区委第一书记兼)

副主席 张伯言 宋立科 梁永恒 肖琳余 刘赢臣
刘永昌

秘书长 刘永昌(兼)

第二届委员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三年七月。有委员 153 人，常务委员 24 人。

主 席 贾庆诰(区委书记兼)

副主席 宋立科 张伯言 梁永恒 肖小田 黄德彰
刘永昌

秘书长 刘永昌(兼)

第三届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七月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有委员 157 人，常务委员 24 人。

主 席 贾庆诩(区委书记兼)
副主席 宋立科 张伯言 梁永恒 肖小田 黄德彰
刘永昌
秘书长 刘永昌(兼)

第四届委员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八〇年八月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止活动）。有委员 157 人，常务委
员 24 人。

主 席 刘 丹(区委书记兼)
副主席 胡定平 张伯言 梁永恒 肖小田 黄德彰
秘书长 胡定平(兼)

第五届委员会：一九八〇年八月至一九八四年四月。有
委员 250 人，常务委员 34 人。

主 席 廖柏枢(区委副书记兼)
副主席 赵明海 雷明贵 陈绍岳 吴荣光
姜 克 (女) 刘继武
秘书长 田名珍(女，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兼)

第六届委员会：一九八四年四月至一九八七年三月。有
委员 271 人，常务委员 41 人。

主 席 廖柏枢
副主席 肖芳达 郝勛荣 陈绍岳 雷明贵 叶振文
吴荣光 包良云
秘书长 罗少扬(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兼)

第七届委员会：一九八七年三月六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有委员 271 人（第二、三次会议期间，委员人数有增加，现有委员 293 人），常务委员 11 人。

主 席 罗有富

副主席 林友才 肖芳达 刘继武 陈绍岳 叶振文

曲 英（女） 张鉴铭 张世武

秘书长 罗少扬

成都市西城区建区的前前后后

范裕珍

成都市西城区于建国后的 1953 年 5 月 20 日建置，至今已有 36 年了。在此建国 40 周年暨成都市解放 40 周年之际，回顾建区的前前后后，藉以振奋精神，激发斗志。

盼解放 迎解放

(一) 西城地区解放前夕的大混乱纪实。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是年国民党丢下的烂摊子与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了 50% 左右，粮食减少 25%，棉花减少 48%；而四川等一切尚未解放的地区更是生产凋敝，民不聊生。有人记载当时成都地区的情况：1949 年 3 月寄一封平信邮费是 5 万元，5 月份却涨到 48 万元；一颗豌豆要金元券 1.5 元，折合法币 450 万元。市物价一日数涨，从法币到银元券、金元券全都成为废纸，出现人们拒绝使用的情况；同时，盗贼猖獗，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朱德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上，命令解放军全军指战员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11 月 1 日，第二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及第四野战军一部，在北起巴东南至天柱的正面战场上发起川黔作战，钳击重庆；与此同时十八兵团在贺龙领导下，也已在秦岭北麓集结。1949 年 11 月 30 日国民党临时首都重庆解

放，蒋介石连夜飞来成都住在北较场“中央军校”内（今西城区新华西路成都军区地址），并派工兵在其住处后面城墙上挖了一个大缺口赶筑一条简易公路直通风凰山飞机场，准备随时逃走。国民党中央高级官员以及后来在台湾当过“总统”的严家淦、蒋经国等几千人纷纷麇集成都，多数龟缩在西城地区内。如国民党行政院及其院长阎锡山住励志社（今商业街四川省委地址），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及其国防部大陆指挥所住倒桑树街（今空军后勤部招待所地址），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及其局长毛人凤住今娘娘庙街38号。“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以及谷正纲、孔德成等住在北门上一家又脏又小的小客栈里，狼狈不堪，如丧家之犬。

（二）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城地区的垂死挣扎。如前所述，临近解放之时，西城地区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而国民党中央高级官员及溃逃至成都周围的胡宗南所部和一些地方部队约40余万人，亦惊恐万状众叛亲离，蒋介石实已至穷途末路的境地。他命令毛人凤将所有政治犯消灭掉，于是12月4日一批凶手便将关在西城地区玉带桥稽查处内的刘仲宣、彭代悌、云龙等秘密杀害于西城地区王建墓甬道内；7日又将关在西城地区将军衙门特委会内的杨伯凯、许寿真、于渊、王干青、晏子良等用绳索捆绑，棉团塞口，拉上刑车秘密杀害于西城地区十二桥处。两次共屠杀35人，解放后统称为“十二桥烈士”，公葬于今西城区文化公园内。当时除秘密处置者外，还在青羊宫、中山公园（今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处公开设置屠场枪决“违犯戒严”的人，造成到处都在杀人的恐怖气氛。12月7日蒋介石宣布国民党政府迁设台北。12月9日和11日，经中国共产党长期争取，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和政策的感召下，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

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在宜宾先后率所部通电起义。12月10日下午2时蒋介石乘飞机逃往台湾。逃时，侍卫人员建议从后门逃走，蒋说：“我从大门进来的，还是从大门出去”。于是蒋介石和蒋经国出军校大门沿北门大街直驱凤凰山飞机场，从此永远逃离大陆，一去而不复返了。蒋介石逃走后，1949年12月20日前后，二野及四野一部攻占邛崃、彭山、简阳地区，十八兵团也于21日抵绵阳、巴中一线，被包围在成都地区的董宋珩、罗广文、陈克非、裴昌会、李振、朱鼎卿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先后率部起义。惟李文兵团继续顽抗被包围于邛崃、蒲江、新津之间地区，26日解放军发起全线进攻，生俘李文，5万余人缴械投降。27日成都宣告和平解放，但其间并非毫无战事。国民党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曾命令其所部于1949年12月12日午夜，包围驻在南郊武侯祠的刘文辉警卫团和新玉沙街的刘文辉公馆，双方隔墙射击，并动用了无后座力炮，刘文辉部因寡不敌众，均纷纷撤退。盛也于24日晚率部离开成都，向西昌方向逃窜途中被解放军全部歼灭。上述城内的两次巷战，均是在西城地区内进行的。

（三）西城地区欢迎解放军入城式的一天。1949年12月30日，成都出现了冬日少有的好天气。一轮娇艳的旭日从薄雾中冉冉升起，蔚蓝色的晴空渐渐显露出来。怀着无限喜悦和激动心情的6万左右群众涌向西城地区的驷马桥集中，等待着解放军从这里开始的入城式。上午10时雄壮的军乐声从远处传来，十八兵团在贺龙、王维舟等同志率领下庄严列队入城了！入城式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为前导，在国旗和军旗后面是骑兵步兵炮兵工兵和重炮

车组成的强大行列，逆着蒋介石逃跑路线的方向，从驷马桥经北门城门向市中心缓缓进发。每当战士的行列暂时停止的时刻群众就像潮水般地涌上去，争先恐后地跟解放军战士握手，把彩色小旗插到战士的背包上，拿出本子请签字，要求战士唱歌。战士们则唱起“东方红，太阳升”、“跟着共产党走”、“推进！推进！向西南、向四川、向一切蒋管区大进军”等歌曲，和着蓉城人民的欢笑声。这天，主要街道的商店门前都挂起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草市街一家商店里一个店员看到自家门口悬挂的五星红旗不够显眼，立即取下来挂在二楼的顶端。市内墙上门上电杆上贴满了“欢迎亲人解放军、欢迎救星共产党”等标语。学生们扭着秧歌唱着刚刚学会的解放区的歌，工人、职员、起义士兵高呼着欢迎的口号，小孩子像过年一样高兴地放着鞭炮，蹦啊！跳啊！从此，成都市进入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社会。

从军事管制到西城区的建立

（四）接收旧政权，改造旧政权。1950年1月20日至3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军管会”）派出代表，接管了旧成都市警察局，其中的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二、第十三分局地处西半城（即西城区前身）。接管后，对其枪支弹药、户口案宗等进行了清点；旧警人员按“包下来”、“宜养不宜赶”的原则，经过短期学习审查，大部分予以录用。接着，“市军管会”公安处各分处相继建立。2月1日，“市军管会”又派出军事代表分别接管了西半城部分的第五、六、七、八、十二、十三和十四区，建立区公所。（当时仅有区长、副区长，办公地址设在各区公安分处，配一至二名民政干事。）区公所根据旧人

员在接管期间的表现与本人自愿，分别予以安置。如第七、第八和第十四区的 30 名旧人员中，留用者 10 人，年老体弱资遣回家者 6 人，自愿回家参加生产者 13 人，予以管制者 1 人。2 月 2 日，为解决群众旧历年关生活困难，各区开展了发放救济粮的工作。16 日，为了稳定物价安定民心，各区公所又配合市贸易公司为贫苦市民抛售平价米，共 1,182 石。2 月 14 日起各公安分处进行匪特自新登记，收缴武器和清核户口等工作。5 月起各区公所开展禁烟禁毒工作。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8 月中旬，各区开展为期一月的整风运动，对品质恶劣，历史不清，作风很坏的分子予以清洗。9 月各区废除旧政权的保甲制度，建立居民委员会。11 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全市展开，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五）开展“三大运动”。1951 年 4 月至 5 月，成都市各区陆续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下简称“各代会”），中心议题是深入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三大运动问题。西半城各区于 1951 年 7 月基本结束了于 1950 年 10 月 25 日开始的对地主退还农民押金的工作。截止 1951 年 10 月，西半城各区的抗美援朝活动如下：群众捐献购买飞机大炮的人民币（旧币）5 亿多元，慰问品 13,000 多件；并有 718 名青年报名参军。1951 年 3 月 27 日，经过准备（1950 年 10 月开始准备），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一次全市性大逮捕。接着各区召开公审大会，进一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拒不自首坦白的反革命分子。5 月中旬，开展取缔“一贯道”活动。11 月 7 日，明令取缔“圣母军”。12 月底“镇反”第一阶段工作结束。第二阶段工作为 1952 年 1 月至 9 月底结束。第三阶段工作为 1952 年 10 月至 1953 年结束。根

据 1953 年人口普查材料，全西城地区有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6,834 人被剥夺了选举权，占当时全区人口 238,045 人的 2.9%。“各代会”时期，根据工作需要，各区设置了办公室、秘书室、民政科、税务分局等工作机构，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六)“三反”、“五反”运动。1952 年 1 月，西半城各区分别在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同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也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 月 13 日，第二区和第三区（均为西城区前身）分别召开了二届二次“各代会”和首届三次“各代会”。会议中心议题是动员全区人民投入“三反”“五反”斗争。第二区当场对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 8 名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给予揭露，并宣布其中 3 人逮捕法办；下午，5 名工商业代表在大会上坦白交待了各自的行贿、偷税等问题。第三区也在会上宣布了逮捕法办七宝庙派出所长、贪污分子李成义。1952 年夏，“三反”、“五反”运动先后胜利结束。1952 年 8 月，西半城各区开始建党工作，至 10 月底止，共吸收新党员 181 名，党员由原来的 127 名增加到 308 名。截止 1952 年底，最终消灭了卖淫、抽鸦片、赌博和酗酒恶习。社会治安完全恢复，人们不再担心被抢劫，不再害怕夜间在街上行走。经过这段时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稳定了形势，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七) 建立西城区，迎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 年 5 月 20 日，成都市人民政府为了适应建设需要，再次调整区划，本着城郊分开原则，在西半城设置了西城区。6 月 8 日正式成立了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同一天，中国共

产党成都市西城区委员会也正式成立。并在此之前和之后，于5月16日至8月26日，经过人口调查、选民资格审查、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名单、分次召开选民大会等工作，选出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名，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注：在此之前，1953年3月29日至4月2日举行的代表会议仍叫“各代会”，行使人民代表大会部分职权，不选举人民政府领导人，正副区长仍由上级任命。1955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会议才选出本届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为了便于计算区人民代表会议次数，将上两次会议统称为西城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次会议。）此时的区政府设置办公室（初为秘书室）、劳动科、民政科、地政科、卫生科、文教科、工商科、财政科和税务分局，计10个工作机构，下辖街道办事处17个（初为16个）。当时区内有工商业者2,000多户，个体手工业者13,000多人，小商小贩12,000多人。1953年9月，党中央正式向全国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相应地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至1957年）。西城区成立后，工作重点则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了。

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

（八）对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7月，中共西城区委为加强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棉织、铁作、缝纫、酿造、皮革等16个行业的79个业别组中，对师徒、雇佣、劳资三种关系进行清理。这些行业的总户数中，师徒关系占1.9%，雇佣关系占31%，劳资关系占

4.3%，未雇工和招收学徒的独立劳动者占 62.8%。在调整关系过程中，对他们提出了走合作化道路的要求，并开始进行组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至 1954 年 6 月，先后在布鞋、皮革、铁器、文印等行业，组建了 9 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共有社员 624 人。1955 年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发展到 58 个，共有社（组）员 2,817 人。1956 年，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即市人民政府）突然提出将全市 96% 以上的小手工业者加入生产合作社或生产合作小组的要求。年底，西城区所管的竹木、棕藤、皮革、鞋帽、文化用品、骨角毛刷等行业中，又组建了 89 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 9 个生产合作小组，连同原来建立的合作社（组），全区共有社（组）122 个，社（组）员 13,242 人。与此同时，1956 年底止，对属于独立劳动者的小商小贩（全区共有 960 户，从业人员 12,336 人）也纳入合作范围，组成了 46 个中心店，2 个合作商店和 485 个分散经营合计盈亏的合作小组。至此，全区个体劳动者的合作化基本完成。

（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 年 10 月，区委在工商户中开展反偷税漏税和反拖欠税款的工作，至 11 月 23 日止，填报自查补报表的工商业者达 2,000 多户，占总户数的 98% 以上。1953 年 12 月，区委批准私营建群铁工厂为西城区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资金合现人民币 19 万多元，职工 159 人）。接着又有 9 家私营厂（坊）接受国家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的任务。到 1954 年底，上述 9 个厂（坊）中的太和酿造厂、济和丝织厂和群能机器厂又实行了公私合营。至此，全区 15 人以上有动力设备和 30 人以上无动力设备的 31 家厂（坊）中，有 5 家进入了公私合营。并结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

议》，取缔了粮食自由贸易市场，对守法粮商的业务纳入国家计划，为国家代销粮食，全区建立了 42 个代销店。1954 年 4 月，又整顿私营油店，使之代销国家食油，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1955 年末，全区公私合营厂（坊）增加到 13 家，同时带动了全区 5 人以上有动力设备及 10 人以上无动力设备的 64 家私营厂（坊）普遍接受了国家的加工定货。1956 年 4 月 26 日，中共成都市西城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指出党内存在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号召为提前和超额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随后在强调反右的情况下，根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作法是：对全区私营工业企业经过清产核资、人事安排、经济改组等工作，按其产品、设备等情况合并成永泰、工建、大公、三江、新四维 5 个基点，和联合风琴厂、国光烟厂等 4 个公私合营工厂。对全区私营商业，也经过清产核资、定股定息、人事安排、调整网点等工作，建立了区（总）店 18 个。至此，城市经济中的私人成分已不复存在了。公私合营中的原来私有者领取 5% 的定息，实际上企业已为国家所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十）1957 年区属工业生产发展概况。诚如前述，西城区的现代工业主要是在 1956 年合作化高潮中组织起来的一些合作社（组），和一部分私营小工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半边桥街的皮布鞋、祠堂街的中西乐器、锣锅巷的木制家具、大墙西街的小木杂件、平安桥的织布机房，分散各处的丝织作坊和服装制帽商店，以及私营洪安机械、济和棉织、纯溪造纸、建群铁工等小工厂。第一年的工业产值为 1, 400 多万元。1957 年开展“整风反右”（后详）和增产节

约运动，年底地方工业总产值达到 2, 139 万元，手工业总产值达到 2, 812 万元。这些成就，加上全国实现了统一货币发行和物价管理，统一指令性经济计划，统一物资管理和粮、油、布等生活资料的统购统销，便奠定了西城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大跃进”的曲折

(十一) 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党的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1958 年，西城区的长达三年多分为四期进行的，肃清暗藏反革命运动将要结束之际（1958 年底结束。1955 年曾导致一场批判“胡风反革命”的政治思想运动），在批判“右倾麻痹思想及各种反动思想言行”的基础上，5 月 3 日至 5 日，西城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号召全区人民团结一致，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坚决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完成 1958 年的国家计划而努力。西城区的整风运动，于 1957 年 5 月 21 日开始。当时区级机关进行着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运动，以“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至 8 月扩展为全区范围的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贴出大字报 60 多万张，提出意见 100 余万条，并针对鸣放中的问题，揭露斗争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379 名（其中工业系统 36 人，文教系统 151 人，财贸系统 135 人，区级机关 57 人）。随后，于 9 月 24 日至 26 日、10 月 27 日到 11 月 11 日、11 月 22 日至 12 月 1 日又先后在各种会议上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和批判了一批“思想严重右倾”的党员干部。整个运动于 1958 年 5 月基本结束。这些“右派分子”除少数外，多数的问题是他们“否定区委领导的业绩，夸

大区委领导的缺点”和攻击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接着，5月下旬又在民主人士、“资产阶级分子”和小学教师中先后开展“交心运动”，拔“白旗”。

(十二) 加速对“残存的资本主义”改造，及“大炼钢铁”群众运动。在“整风反右”的基础上，1958年7月8日，区委决定对全区277户“残存的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从业人员1,159人），和12,797户小商小贩（从业人员16,323人）以“跃进”的速度，将他们的生产资料迅速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运用“整风”的方法开展“大鸣大放辩论”，在一个多月内将那些“残存的资本主义”户，全部转为定息户；将所有的小商小贩（包括部分小业主）经过大合并、大调动之后，一部分带入国营企业，大部分组成共负盈亏或自负盈亏的合作商店（组）。同时，用了半年时间，将社会闲散人员2万多人组织起来，兴办街道厂（社、组）745个。将全区私人运输业的架架车、三轮车、兽力车3,791辆，全部转入国营或国合合营。（又一说法：三千多部车辆只是架架车和兽力车，未包括三轮车。三轮车在此之前已由街道办事处组织成三轮车管理站管起来了，属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性质。三千多部车辆全部吸收入国营搬运公司，人员全部变为搬运公司工人，并无“国合合营”的印象。）采取车子折价分期偿还，或“一步登天”的办法，组建了西城区搬运公司。8月26日，区委又决定将108个（一说138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分三批转为48个地方国营工厂。同进，将1,190户个体手工业劳动者，也吸收进了国营工厂。至此，全区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及个体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在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全部完成后，于1958年9月下旬，西城区成立钢铁办公室，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

的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十三)“反右倾”斗争的错误。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8月26日,区委决定在全区干部和职工中,掀起“反右倾、鼓干劲、励行增产节约”的高潮。由区委在体育场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拥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反右倾、鼓干劲,奋勇跃进”的誓师大会。全区干部和职工每周学习6至8小时,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各系统乃以动员会、誓师会、先进生产者座谈会、“打擂比武”等各种形式充分发动群众,迅速落实完成各项生产指标的措施。10月26日,区委召开基层党员领导干部以上,历时一月的“三级干部”会议,揭发批判本区党员干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思想严重右倾的人。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的办法,有22名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思想严重右倾”的人,遭到批判斗争。他们的“错误”主要是“攻击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毁谤农业丰收是虚报浮夸”、“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反对群众运动和政治挂帅”等。这次会议之后,反“右倾”的斗争在各系统相继展开。10月30日,为了形成更更猛的“反右倾”运动,还动员区级机关的非党干部“学习总路线,检查自己,揭发他人违背总路线的思想和言行”。一般党员和区级机关的非党干部有15人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思想严重右倾”的人,被批判斗争。整个反右倾运动于1960年1月底结束。

(十四)“大跃进”的高指标与城市人民公社的浮沉。1958年5月25日,区委报市委审批的《1958年至1962年工业、手工业和教育五年发展规划(草案)》,要求“地方工业

总产值拟由 1957 年的 2, 139 万元增至 1962 年的 28, 353 万元, 手工业总产值拟由 1957 年的 2, 812 万元增至 1962 年的 28, 131 万元”。均翻了 10 番。1960 年 5 月 13 日至 22 日, 区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 批判各种右倾保守思想和消极畏难情绪。会议期间除开展比思想跃进, 比生产指标先进的“打插比武”外, 还召开了新技术推广誓师大会, 以推动全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6 月末, 区委抽调机关各部、局、科、室和各厂、社的领导干部 465 名深入生产第一线; 又抽出基层干部 1, 800 多名同群众“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 以掀起生产大战的高潮。“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 促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 高速度地建成社会主义的工业城市”, 区委于 1958 年 8 月 22 日决定, 在宁夏街地区试点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后, 1960 年 3 月 1 日, 西城区第一个城市人民公社——宁夏人民公社诞生了。接着便开展了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 至 7 月上旬, 黄瓦、金河、草堂、鼓楼、驷马桥 5 个人民公社先后成立(未计算各公社所辖之分社), 实现了全区城市人民公社化。上述 6 个人民公社的正、副社长均由区级机关领导同志兼任, 将公社的牌子挂在某一个街道办事处门上, 将全区其余的街道办事处分别就近划归其统属。除公社驻地的街道办事处外, 其余凡有派出所的街道办事处均设分社。如宁夏、草堂、驷马桥 3 个公社各辖 3 个分社; 金河、鼓楼、黄瓦 3 个公社各辖 2 个分社。公社和分社同街道办事处并存, “两个牌子一套人马”。1961 年 9 月, 区委重新按原来的街道办事处任命干部, 并按各街道办事处范围开展工作。1962 年正式撤销城市人民公社, 完全恢复原来各街道办事处的建制。城市人民公社曾经被视